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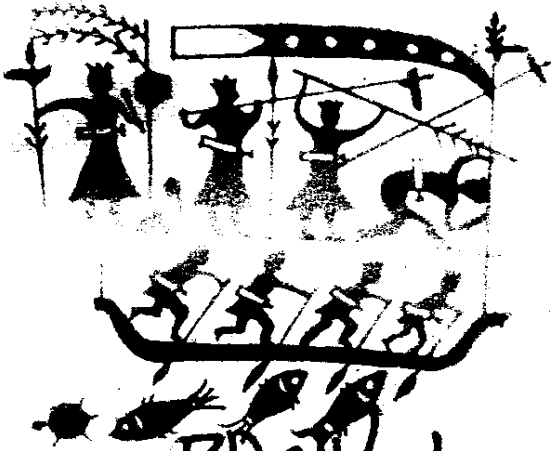
读史举要

苏渊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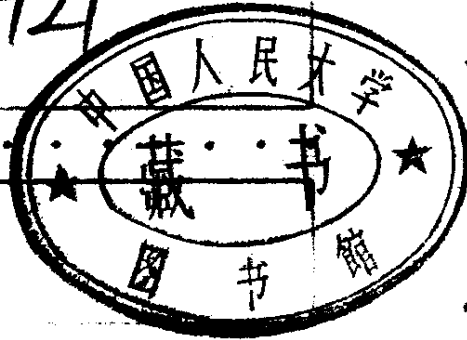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2(2)/38

997645



RD04/21



读史举要

苏渊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遇秀伟
封面 刘惠民
扉页设计

读 史 举 要
苏 渊 雷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0 8/16·插页 2·字数 210,000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20

统一书号: 11093·65 定价: 0.91

目 录

第一章 读史要义	(1)
(一) 不读史无以见中国历史传统的悠久	(1)
(二) 不读史无以见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	(3)
(三) 不读史无以见先民斗争史迹的光荣	(4)
(四) 不读史无以见中外文化交流影响的远大	(6)
(五) 执简驭繁 心知其意	(9)
第二章 关于史料学上的若干问题	(23)
(一) 史料的类别及其阶级性	(25)
(二) 史料来源与辨伪工作	(30)
(三) 史料鉴别的几种方法	(36)
(四) 怎样运用与分析史料	(39)
第三章 诗三百篇与尚书	(47)
(一) 诗三百篇	(48)
(二) 尚书与逸周书	(54)
第四章 春秋三传	(65)
(一) 春秋修订旨趣	(65)
(二) 左氏不传春秋说	(69)
(三) 左传与国语是一是二问题	(71)
(四) 春秋书法举例	(74)
(五) 三传各具的特色	(79)
(六) 左传在文学上的价值	(82)
(七) 三传读法及参考用书	(83)

第五章 诸子论纲	(87)
(一) 研究诸子学说的现实意义	(87)
(二) 诸子争鸣的时代背景	(90)
(三) 诸子学说要义评介	(92)
(四) 历来对百家的评论和总结	(101)
(五) 目前尚在争论的问题	(105)
附: 孔学演变过程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113)
第六章 马班异同论	(121)
(一) 史记汉书所体现的倾向性	(121)
(二) 司马迁班固的风格异同	(131)
(三) 简要结论	(148)
附: 司马迁及其文章风格	(152)
第七章 资治通鉴简论	(178)
(一) 著书动机及编纂过程	(179)
(二) 通鉴体例及其特点	(181)
(三) 编纂学和史学思想一斑	(186)
(四) 姊妹篇。胡注及其他	(190)
第八章 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的史学成就	
及其异同	(198)
(一) 刘知几写作《史通》的历史意义	(199)
(二) 郑樵通志“总天下之大学术”	(209)
(三) 章学诚的文史校讎之学	(222)
(四) 余论	(240)
第九章 汉唐佛学对于中古哲学和文学的影响	(248)
(一) 汉唐佛教发展史迹及其一般影响	(249)
(二) 佛学和中古哲学的交融	(254)
(三) 禅风给中古哲学家打开了思想活路	(260)

(四) 佛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264)
(五) 禅宗对于古典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启发·····	(268)
附一: 大小乘佛学的系统·····	(273)
附二: 道安、罗什、法显、玄奘对 中国佛学的重大贡献·····	(277)
附三: 隋唐佛学的新气象·····	(294)
第十章 祖国历史文物综述 ·····	(301)
(一) 最古的文化遗存·····	(301)
(二) 惊人的建筑工程和都市规划·····	(305)
(三) 瑰丽圆浑的雕塑艺术·····	(308)
(四) 精美晶莹的瓷器·····	(311)
(五) 丰富多采的手工艺·····	(316)
(六) 文化传播工具的创造·····	(320)
(七) 卓越优秀的美术创作·····	(322)

第一章 读史要义

中国史书，浩如烟海。宋时已有“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文天祥对元丞相博罗语）之叹。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自谓“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见《宋史·王曙传》），可见史籍繁浩，读者生畏，由来已久了。今则由十七史而廿一史而廿四史、廿五史，加上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杂史、别史等，不下数万卷^①。在百学待治的今天，要求大家都能抽出时间坐下来阅读一些古书，来增进历史基础知识，虽然不算过分；但是史籍如此丰富，令人有“望洋兴叹”之感，加上如恩格斯所说的“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474 页）。那种只讲一般规律，不了解、不研究历史具体性的偏向，还不是个别的情况，怎样纠正这种偏向，使史和论正确地结合起来，应当是我们目前研究历史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到底读史有哪些好处呢？依我想来：

（一）不读史无以见中国 历史传统的悠久

中国为世界上古史著录最完整的国家。从黄帝传说以

来，约得四千六百五十余年，从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代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据《尚书尧典》则应託始于公元前二千四百年；据甲骨文，则始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据《诗三百篇》，则始于公元前一千一百年。这些历史不但有典籍可稽，而且记录从未间断：从周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历史纪元，大事记载，逾数千年而不断。这在并世诸国，若英法等，大抵兴于六、七世纪（约当梁、唐时代）已后；即日本号称万世一系，然其隋唐以前的历史，大都出于传说，文献不足征信。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的《历史》即《希波战争史》九卷，每卷皆以女神缪司的名字命名，即不是按着年月顺序编排的编年史，也不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而是以故事为中心的叙述体；他对神话、故事抱着有闻必录的态度，很少加以批判（参阅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及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至东方古国如埃及、两河流域诸国古史迹，多由后人从各种遗物及杂记中推导而得，并非有正式的原始记录。如埃及帕列尔摩石（Palenmos. stone）铭文，时间虽早（约当公元前2750—2625年），既不能作为历史著作，又没有作者主名，所以又当别论。其在中国，史有专职，太史尹氏一类官早在殷周之际就已经出现。先秦列国已有史官的记录，自汉以来，宫廷有起居注，六朝以下又有实录、日历，宰相有时政记，贵族世系有玉牒，平民也有族谱，各地方有都邑簿、方志一类著作，历朝科举有登科录……，至撰述史籍的机关和制度，

也始终以政府所办的国史馆、实录馆等为主；宋元以后，各地方从事收集地方史的方志馆、局各机关，也是半官办性质的，其体制和方向，大略与国史相同。所谓野史即私人撰述，汉代以来就已发达，明清以后更趋丰富。这就使得我国历史无间断地保留下来。即此一端，足够说明我国古史记录的完备和传统的悠久了。

(二) 不读史无以见中国 文化遗产的丰富

《尚书》记录了三千年前的政府档案，包括了会议录、公告、誓师词、经济调查等原始形式，是一部最早的《历史文选》。《诗三百篇》广泛地反映出西周时代黄河流域十五国各阶层以及劳动人民的生活现实，极富史料价值，同时是一部最早的《歌谣总集》。《春秋》虽被讥为“断烂朝报”，但是那种“以事系年”的编年体例，象现在报纸上大小标题式的“笔法”，在二千六百八十多年前，即已首创一格，不能说不是世界史学史上空前的创造。书中有关日食的记载，经近代天文学家的考证，证明它的记录完全正确。在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日食三十七次，其中有三十三次是可靠的；最早的一次“鲁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约当公元前720年2月22日），比希腊泰利斯（Thales）所记日食早一百三十五年。《禹贡》上有关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区分，土壤性质的分析，土特产分布的调查，处处显示出我们祖先对于科学精神的素养。此外，关于土地制度的沿革，军事组织的演变，河防水利的

建设，工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散见于历代《食货志》、《地理志》、《兵志》及《通典》、《通考》等政书和笔记中，材料更是丰富。乃至诸子百家独立思考的结晶，百工技士“天工开物”的发明，文学艺术丰富多彩的创作，朴素民主政治思想的倡导，主要集结在各史的《列传》和《志书》中；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苏鹗的《杜阳杂编》、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朱或的《萍洲可谈》、明陶宗仪的《辍耕录》、郎瑛的《七修类稿》等有关文化史料的记载，都是我们应当涉猎的。梁启超曾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纪录，无不丛纳之于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这话是不错的。

（三）不读史无以见先民 斗争史迹的光荣

无论在民族自卫或阶级斗争方面，我们祖先都有过光荣的传统。毛泽东同志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6页）

远从周宣王时代，“薄伐玁狁”，进行了积极的防御，安定了居民，制止了强掠，以至汉代的先后反抗其他部族的骚扰，“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班固：《封燕然山铭》）；我国境内各族间虽然发生过多战战争，但民族的融合总是占主

导地位的，要求民族独立和平等的精神始终贯串着全部的历史。其次，在阶级斗争和反对暴力统治上，秦末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至历代农民战争，“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6页）尽管这样，它们还是能够直接间接影响下一政权的若干措施，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种素朴的、机智的、革命英勇的一面，和落后的、散慢的、保守的一面，都在不同程度上积成几千年历史的教训，为后来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提供可贵的教训。这在《史记·陈涉世家》、《后汉书·刘盆子传》、《晋书·孙恩传》、《唐书·黄巢传》，以及在各史有关人物传记典型性格的塑造中，处处给我们以精神的鼓舞。此外，每一历史时期一些所谓“仁人义士”比较突出的勇敢抗暴和爱国的行动，如乐毅的笃忠，鲁仲连的排难解纷，邹忌、王斗、触谿的进说，屈原的眷怀故国，贾谊的痛惜危时，游侠之士的“轻死生、重然诺、赴士之困厄”，党锢诸君子的“激扬清浊”，演至“望门投止”，临刑告别家人，说出“我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吾不为恶”的沉痛语；乃至唐刘蕡的对策文宗，极陈宦官之祸，宋文天祥的《正气歌》，传出从容就义的呼声；明杨涟的《劾逆阉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大义凛然，志不可夺。再如桓谭、王充，坚持真理，反对谶纬；

范缜傅奕，不畏众议，著论辟佛。鲍生发“无君”之论，邓牧心著《伯牙琴》，黄宗羲著《待访录》，寄恨专制政治的毒害，李贽著《焚书》，反对程朱理学，戴震疏证《孟子字义》，宣告“理学杀人”的罪状，所有这些思想史上的积极因素，对于近百年来的民主启蒙运动，实有其“积厚流光”的一贯性。

(四) 不读史无以见中外文 化交流影响的远大

商周之交，箕子近封于朝鲜；秦汉之际，徐福远访于日本，这些仍是传说暂且不去说它。但在古地理书《山海经》上已提到朝鲜，《周书·王会解》有月支，《吕氏春秋·古乐篇》有大夏，说明先秦以来我们祖先已和中亚、西亚、东亚各族人民有了往来。汉武帝全盛时代，通过张骞和副使先后二次（公元前138—126年、公元前115年）的出使西域，亲历大宛（今浩罕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安息（今波斯）、大夏（今阿富汗境）、乌孙（今伊犁河南）等国。跟着海上交通也慢慢展开，有名的中国丝织品多改从海道运出，由广东出口，通航南洋和印度洋，最远和安息及大秦（罗马）诸国的市场交易。从此，新奇的商品先后从海道输入中国的，有琉璃（最近发现战国时已有）、琥珀、水晶、香料、金丝织品、毛织品、棉织品（木棉、草棉、石棉）等，从陆路和伊朗高原输入的，有大宛的天马、蒲桃、苜蓿（紫云英）、胡麻（芝麻）、安息的驼鸟、狮子、石榴以及西域各处的农产品：胡桃、蚕豆、胡萝卜、胡姜、胡瓜（王

瓜)、大蒜等种子,依据各种记载,这些东西都从张骞等通西域后,经过印度南北两市场直接间接输入的,它在丰富中国人民物质生活上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也因此传入西域,铸造兵器的技术以及凿井和利用地下渠道的方法,都曾介绍到大宛。这对中亚各民族的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公元一世纪末,西域都护班超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虽为安息商人所阻,抵波斯湾后即东返;但以后大秦商人与使者仍来到中国。《后汉书》载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安敦当即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可能是西方商人假借名义来进行贸易。从此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就扩大到欧洲。说到影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生活之深远,无过印度佛教经过大月氏输入中国这一件事了。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人在洛阳口授佛经起(说从《魏略西戎传》及《魏书释老志》),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昙无讫等的东来,法显、玄奘、义净等西去,在中、印乃至和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文化交流史上,都起了重大桥梁作用(梵语中称桃为“秦地持来”,称梨为“秦地王子”,钢和红铅、樟脑等名称亦冠以秦地字样,菠菜一称菠楞菜,或谓来自尼泊尔)。中国对于四邻民族文化的接触,经常给予良好的印象。唐时日本使臣来朝,往往慕中国之风,不肯回去。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今是堂手录》说:“日本使者过海有诗曰:‘水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时贾岛佯为梢人,即联其下云:‘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使者嘉叹久之,自此遂不敢言诗”。

日本九世纪末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

所存的汉文书籍，有一千九百九十九部，一万六千多卷，包括文、史、哲、艺术和科技等方面的书籍。

东渡日本的中国名僧鉴真对传播唐代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通晓医学，曾向日本传授病理学和药物学知识。

大致在八世纪以前，日本仍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后来日本用汉字为音符创造出自己的“假名”，用以表达日本的语言。至于《白氏长庆集》不仅传至高丽而且远及日本，对日本平安朝的文学，影响更鉅。平安时代的诗集《和汉朗咏集》共收录了五百八十九首诗句，其中白居易的诗就有一百三十七首之多。唐初设国学，高丽、百济、新罗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孙请求入学，大学生一度增至八千余人。温庭筠《赠渤海国王子》诗，有“佳句满中华”之句，想见当时长安留学生文化生活的多采。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吉备真备，对中国的诗文都有较深的造诣，小野篁、桔逸势、菅原道真等也都以中国诗文擅长。他如西域一带音乐舞曲的影响中国诗词曲，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壁画，雕塑，乃至中国的三大发明——罗针、火药、印刷术的相继输入欧洲，影响于近代世界史的大变动；弗朗西斯·培根甚至说：“这三种发明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印刷术在文学；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对世界的影响》）。十八世纪后中国古典小说继续输入欧洲引起歌德、席勒、伏尔泰、高尔德斯密士等德法英国文豪重视，有的且从而仿制（如伏尔泰之《查第格》）；歌德至谓：“当他们（指中国）

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这些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名的故事。

(五) 执简驭繁 心知其意

所有上述这些，必须通过读史这一关，从掌握基础知识入手；进一步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也只有这样才使得我们了然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从而爱国主义的精神，不觉“油然而生”了。“历史科学密切地联系现代各国人民的生活而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确定社会在其存在各阶段上的发展法则，并且揭发那些将要决定事变继续进程的现象和内在因素，因此，它对于未来历史过程、未来各国人民命运的科学预见，可以提供极有价值的材料。”

说到读史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意义，到底是怎样的呢？从发展上说，我们对于当前每一问题的发生，必须掌握足够的历史资料，才能有助于问题的全般考虑。例如治河问题很重要，在我们制订计划之先，必须对黄河的史的发展，有了初步的全面认识，然后才能摸清规律，本末兼施。例如说，我们得先知道黄河三千多年来决口不下一千五百次，重要改道二十六次，其中有那几次大变迁：

①春秋周定王五年（公元前 602 年）第一次大改道。

②汉元光中（公元前 130 年左右）河决瓠子（今河南濮阳），武帝筑宣防宫；特别是东汉明帝十二年（公元 69 年）王景导河后，形成长期安流局面，至唐千年不为害（西汉前

黄河在今河北境入海，此后改由山东入海)。

③五代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河决滑州，侵汴、曹、濮、单、郛五州(今河南、山东境内)，自北而东。

④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大决于澶州曹村，河道南徙，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自东而南。

⑤宋元丰以后(公元1078年)，决而北徙。

⑥金元以后，日趋于南，中牟以下夺汴水，徐州以下夺泗水，清口以下夺淮，凡三夺始入海。

同时还要知道历史上总结出来的三十三字治河经验，即“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后汉书·王景传》)；这些整理河床、修固堤防，兴建水门，兼具分流、减水、滞洪、放淤诸作用的根本原则，然后才能“因势利导”、设法制伏它，根治它。

又如西藏问题发生后，关于西藏和中原王朝的历史关系，我们必须把从唐文成公主远嫁和亲与吐蕃甥舅会盟立碑起，至元封发思巴(亦作八思巴)为“大宝法王”，明封宗喀巴、清封达赖、班禅以及政治上种种制置史实加以研究后，才能有力地驳斥西藏反动集团和帝国主义等对于西藏历史上“独立”的谰言。对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坚持所谓“麦克马洪线”的澄清，也是根据历来无可争辩的史实和文献予以全面驳退的。又如，远在汉唐时代，我国就在古称“西域”的新疆地区设立官府，驻扎军队，实行屯垦，天山南北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划入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版图。

我国著名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出生于天山西部的碎叶城。他对天山奇丽景色的描写，留下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等脍炙人口的诗句。经宋、元、明三朝，这种内地与边疆各族人民的血肉关系，绵延不断。清朝政府于一七六二年，在新疆派驻军政长官，统辖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一八八四年正式建立新疆省。这些都要求我们首先掌握足够的历史文献资料，然后才能提供坚确不拔的论据，使人信服。

总之，熟谙史事和掌故，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明了客观形势的发展，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也可以从这些具体生动的史例中，吸取珍贵的教训，作为个人处理问题和干预生活的借镜。史称汉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旄，黄衣黄帽，诈称卫太子诣阙；“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即叱从吏收缚，引《春秋》“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的故事，以释群疑。当时以为“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汉书·隽不疑传》）之证。三国时吕蒙识超鲁肃，由于他能读《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特，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三国志·吕蒙传》注）。刘琦以不得后母欢，每欲与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一日邀共登楼饮宴，令人去梯；诸葛亮即告以“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的故事，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三国志·诸葛亮传》）。魏崔浩主伐凉州，实本之《汉书地理志》，他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又汉人终不于无水草地筑城郭建郡县